

陕西文物古迹大观

(三) 陕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巡礼

陕西省文物局编



陕西文物古迹大观

GRAND SIGHT OF SHAANXI HISTORICAL RELICS AND SITE

(三)

陕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巡礼

陕西省文物局 / 编

三秦出版社
SANQ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西文物古迹大观(三):陕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巡礼 / 陕西省文物局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10
ISBN 7-80736-121-2

I. 陕... II. 陕... III. ①名胜古迹—简介—陕西省
②历史文物—简介—陕西省 IV. K928.70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6456 号

陕西文物古迹大观(三)

陕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巡礼
陕西省文物局 编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西安新华印刷厂
开本 889 × 1194 1/16
印张 38.5
插页 4
字数 1054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36-121-2/K · 78
定 价 230.00 元



序

言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 赵荣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陕西地处黄河中游，是摇篮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文荟萃。《尚书·禹贡》说这里“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司马迁《史记》说这里“膏壤沃野千里”，称之为“天府”。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是陕西成为我国古代文明主要发祥地之一的重要因素。我们的祖先自远古以来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袤无垠的土地之上。这里不仅有旧石器时代的蓝田人、大荔人遗址及新石器时代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客省庄文化遗存，更有大量的夏、商文化及丰富的周、秦、汉、唐的重要文物遗存。建国以来，一个个震动国内外的重大考古发现，都使人们对陕西刮目相看。在全国，陕西作为文物大省的特殊地位早已著称于世。

“长安自古帝王都”，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000余年，尤其周、秦、汉、唐等历史鼎盛时期的重要朝代均建都于此，陕西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历史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典型的原始聚落遗址、规模庞大的都城遗址、宫殿、官署、礼仪性建筑遗址、皇家园囿、帝王陵墓，更有绚丽的彩陶、神秘的青铜器、珍贵的玉器、秦砖汉瓦、唐三彩、贵重的金银器等国之瑰宝，这既是陕西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样，近现代以来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等各地都有遗物，尤其陕北最为集中，使陕西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举世瞩目的光辉地位。根据1989年文物普查资料统计，全省各类文物点共有35750多处，与全国各兄弟省市文物点相比，陕西文物点的密度之大，数量之多，均居全国之首。截至目前我省已有140处（171个文物点）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15处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90处被各地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被公布的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仅是全省3万多处文物点的极小部分，但它们却是最精华的一部分，它们都是经过多次文物普查、考古调查或勘探，或发掘，或维修，最终筛选研究确定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的典型单位。它们是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绵延百万年不断前进的悠久历史的体现，从不同领域和侧面记载了中华民族以顽强的精神创造人类文明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伟大民族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我国的文化遗产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像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保持民族文化传承，是联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各项原则和规定，对我国新时期的文物保护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最近陕西省人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了《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已于2006年10月1日起实行，使我们的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到法制管理轨道。在实施这些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在对所有的文物进行全面保护的基础上，从中央到地方分别公布了全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收到良好的效果。

陕西省文物局组织编写的《陕西省文物古迹大观》已出版过第一、第二分册，本书是其第三分册。第三分册的内容是对陕西省人民政府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公布的第一至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最新情况的资料介绍，并配有大量照片和插图，以便参考阅读。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及陕西的各项建设有所裨益。同时也希望本书能在普及文物知识、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6年10月10日

前

言

巩 启 明





本书是1998年和2003年陕西省文物局编写出版的第一、二册《陕西文物古迹大观》的续编，是对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第一至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介绍。第一至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于1956年8月6日、1957年5月31日、1992年4月20日及2003年9月24日公布，其中除晋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调整撤消的部分单位外，现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65处。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及其他等。它们都分布在全省11个地级市、区内，即西安市73处、铜川市16处、渭南市59处、咸阳市75处、杨陵区2处、宝鸡市95处、汉中市25处、安康市26处、商洛市21处、延安市34处、榆林市39处。若按类别分，各市区的情况不尽一致，少数市各类都有，多数市区类别不全。现从全省范围内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介绍。

古遗址类共186处，其中属旧石器时代的2处，新石器时代的84处，夏商先周19处、西周25处、春秋战国5处、秦汉魏晋南北朝34处、隋唐6处、宋元明清12处。这些遗址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文物普查及考古调查发现的，部分遗址已进行过不同规模的考古发掘或试掘工作，所发现的遗迹遗物相当重要。如1981年西北大学地理系黄春长先生在蓝田辋川河右岸东沟峭壁上发现的锡水洞旧石器洞穴遗址，发现打制石器30多件，同时还发现有骨刀、骨铲、骨锥、烧石块、烧土块、烧骨及灰烬层堆积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石器特点属于中国旧石器文化中的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与蓝田公王岭及陈家窝直立人的石器特点接近，其时代应属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80~100万年左右。上世纪60~80年代在关中和陕南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初期晚一阶段的(距今7000~8000年)老官台文化，如临潼白家、临渭北刘下层、宝鸡北首岭下层、西乡李家村、商州紫荆下层等都是相当重要的聚落遗址。这些遗址都经过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发现了一大批重要遗迹，如房址、窖穴、墓葬等，遗物有磨制的生产工具石斧、石铲、石刀、磨盘、磨棒、石凿、骨矛、骨锥、骨簇、骨刀、骨针等；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其特点是烧制火候较高，陶色总体呈红色，但有不纯正现象，器表多有灰或黑色斑块，器形有圜底钵、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小口鼓腹罐及鼓腹瓮等，与已知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的陶器特点迥然不同。老官台文化的发现不仅对研究陕西境内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发展序列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研究我国早期农业的起源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距今5000~7000年)在全省各地都有分布，总计有2000余处，除已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华县元君庙——泉护村外，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蓝田洩湖、华阴横阵、西关堡、彬县下孟村、宝鸡北首岭、福临堡、陇县原子头、千阳丰头、扶风案板、南郑龙岗寺、西乡何家湾、安康柳家河、商州紫荆、铜川王家河、富县交道、靖边五庄果墚等50余处，其中部分遗址已进行过不同规模的试掘或发掘工作，出土遗迹遗物相当丰富，有的遗址地层关系特别清晰。如洩湖遗址的地层情况：从上到下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战国层，第三层为西周层，第四层为客省庄二期文化层，第五层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第六层为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文化层，第七层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文化层，第八层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文化层，第九层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文化层，再下为生黄土，文化层厚度最深处达10余米。这里除最上部的耕土层外，其下的八个文化层中，最下的六个文化层均属史前阶段，文化的叠压关系特别重要，为陕西

史前考古的分期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科学资料。龙岗寺遗址的发掘，发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葬423座，分群的有序排列情况，对当时氏族组织社会结构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批墓葬的随葬品也较重要，尤其用玉斧、玉刀、玉铲、玉锛、绿松石坠饰等大量精美玉器随葬，在同期文化遗存中殊为罕见，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综合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案板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发现该遗址总面积约70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晚期特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址。在遗址中部发掘清理出一座平面呈凹字形结构比较复杂的大型房屋，建筑面积达165.2平方米，为同期遗址中所罕见。研究者认为这座大型房屋的用途不仅是本聚落居民日常重要生活的所在，同时也是附近众多聚落的中心聚落，是用于集会、议事、祭祀及举行某种重要庆典或仪式的场所。案板遗址仰韶文化晚期中心聚落大型房屋建筑的发现，为研究当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发展阶段提供了异常重要的科学依据。另外，原子头遗址和丰头遗址的发掘，出土了一大批彩陶器，彩色纹样绚丽，为研究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增添了极为珍贵的新资料。龙山时代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距今4500~5000年)除安康外全省多数市区都有分布，关中和陕北数量较多。上世纪的50年代及80年代先后发掘的华阴横阵遗址、扶风案板遗址都有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重要遗存，这不仅解决了它与其他史前文化的相对年代问题，同时也积累了一大批科学资料，使我们对它的文化面貌、文化性质、各种遗迹遗物的特点等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近年来我们对陕北的考古工作有所加强，在对佳县石摞摞山遗址的发掘中，发现属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城址一处，填补了陕西地区没有早期城址的空白。该城址有内外两重城墙，内城建在山顶，平面呈方形，城内面积约3000平方米，外城建于整个山体的中下部，平面呈不规则形，城内面积约近6万平方米。内外城墙均用石块及黄泥砌筑而成，多依生黄土崖面构建，形成包崖镶坡的台城形式，厚度多在0.7~1.2米之间，残存高度多在1~2米之间，最高处保存有3.4米。外城墙之外侧发现有城壕，宽10米，深达6.4米。城壕之内侧发现有石砌护坡设施。城内发现有大批房屋和窖穴建筑。房址的形状多为圆形和方形半地穴式的单体建筑，同时还发现有带庭院的多室房址，由院墙、庭院、主室、侧室等部分组成，结构复杂，应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典型居住址，为过去已知同类文化遗存所罕见。石摞摞山龙山时代早期城址的发现，与邻近内蒙古境内已发现的龙山时代小石城相比，其建筑结构之复杂、完善，功能、形制之清晰，都是它们所不能比拟的。这一发现为研究北方地区古代文明的进程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004年在吴堡后寨子峁遗址发掘发现的城址，为我国文明探源的研究又增添了新的资料。属于龙山时代晚期客省庄二期文化(距今约4000~4500年)的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遗址出土的玉璧、玉琮、玉钺、玉璋等大批礼器，对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以及早期国家的形成都有重要价值。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在河南地区于上世纪的50年代末即已开始，经过多年的努力，于70年代末，在学术界基本公认二里头文化为夏代文化遗存，这样很自然地给陕西提出了问题，即与河南紧邻的陕西有没有夏时期的二里头文化，令人感到茫然。但在学术界夏文化探索的热潮中，陕西已感紧迫，当时的省文化局已及时地将此项任务安排给有关单位。当时知道的有关陕西夏文化的线索只有文献所记的几位夏王在陕西的活动情况，以及后来(1980)北京大学发表的华县南沙村的资料。实际上我们于70年代末已开始了陕西夏文化的探索工作，计划从已知的客省庄二期文化(陕西龙山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址的分期中探寻夏文化的踪迹。此后，二十多年来，陆续调查发掘了一批龙

山时代及商代遗址，如临潼康家、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扶风壹家堡、武功郑家坡、岸底、长武碾子坡、礼泉朱马嘴、华县南沙村、西安老牛坡、商州东龙山、城固宝山等。通过这些工作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客省庄二期文化及商代文化的认识，同时也使陕西夏文化实现了零的突破。在对南沙村的发掘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堆积层，在老牛坡也发现了晚于龙山早于商文化的与夏代纪年相当的文化遗存，尤其是近年来大规模发掘的以二里头文化为主的东龙山遗址，收获相当丰富，出土的大批房址、窖穴、墓葬等遗迹以及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特点都与河南典型的二里头文化相同或相似，从总的来看这里的文化面貌、文化性质的特征虽有一些地域性，但基本上是一致的。截至目前，我们对陕西夏文化的探索，已发现了几处二里头文化遗址，及一些相当夏纪年的文化遗存，有了良好的开端，为今后的继续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关于陕西商文化的研究，长期来也是不甚了解的，在20世纪的80年代以前我们只是知道一些零星征集的青铜器及其出土地点而已，后来我们经过对上述多处商代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才对陕西商文化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从近20多年来所积累的资料来看，关中东部商文化遗存的特征与河南典型商文化的面貌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关中西部则是受商文化影响下的先周文化(含先后融合的刘家文化及碾子坡文化)。已公布为“省保”单位的西周遗址，有岐山王家嘴、赵家台、丁童、孙家、宝鸡茹家庄、扶风下康、白龙湾、东渠、陈仓贾村、凤翔水沟、千阳新民、陇县峪头一号、眉县东坡、杨家村、临潼西段等20多处。这些遗址中有的是典型的聚落遗址，有的是封国、封邑遗址，有的出土过重要青铜器。如茹家庄遗址，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曾发掘过较大型的墓葬2座，马坑、车马坑及铜器窖藏各1处，同时在附近的竹园沟、纸坊头清理墓葬20余座，出土青铜器及其他文物3000多件。从铜器铭文的鱼伯、鱼季等内容可知其同属于一个家族墓地，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到中晚期。研究者认为这些墓葬为古文献失载的古鱼国文化遗存，属于古代氐人的一支，与早期蜀文化有密切关系。并推测鱼国的中心区域应在渭水南岸的清姜河流域，兴盛时期，势力北界可达渭北千河以西、千山以南，与矢国相邻，南界可达秦岭以南嘉陵江上游各地。贾村遗址，包括贾村，上官一号、二号，扶托及秦家滩五个遗址。贾村遗址曾出土过著名的西周青铜器何尊。上官一号遗址出土过重要青铜器“矢王簋盖”。扶托遗址出土过“矢僕簋”。研究者从“矢王簋盖”等铭文分析，认为这些青铜器应为古文献失载的矢国遗存，并进一步推测矢国的活动范围应在千河流域，西周中晚期矢国的活动重心应在千河下游，即今的宝鸡市千河东岸及陈仓区一带。杨家村遗址，自上世纪的50年代开始，屡有重器出土，1953年、1954年、1983年、1985年及2003年都有西周重要青铜器出土，尤其是2003年1月19日发现的一窖青铜器，共27件，全部有铭文，计有4000多字，超过300字的就有多件。专家认为这里应是单氏家族的封地，这些铜器全是单氏家族的遗物。铭文涉及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礼制及周王世系、年代等各个方面，内容相当丰富，为周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说：眉县杨家村青铜器是震惊中国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对学术界是一次震撼，其意义怎么说都不会过分。这一发现被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另外西段遗址出土的利簋，实证了司马迁《史记》所记武王克殷的史实，被学术界视为国之瑰宝。凤翔水沟遗址于2004年12月31日由北大等单位组成的周公庙考古队调查发现古城址一座，整体呈方形，城墙周长4000

多米，墙体最高处达6.5米，厚5米余，城内总面积达140万平方米。考古队从遗址的地层、文物、筑墙技术等情况分析，认为此城址应为西周早期所建，并认为这是西周考古迄今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城址。属于春秋战国的文化遗存，除了秦雍城、秦咸阳，秦栎阳等都城遗址已列入“国保”单位外，尚有不少重要遗址公布为“省保”单位，如陈仓全家沟、宁王、贺家湾、戴家湾、陇县韦家庄、边家庄、千阳前川、凤翔孙家南头(蕲年宫)、丹凤商邑等。这些遗址，有的是封邑，如边家庄遗址，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内涵丰富。1979年、1982年、1986年曾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34座，车马坑数座，出土青铜器等重要文物700多件。研究者认为边家庄墓群应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一处规格较高的贵族墓地。孙家南头宫殿遗址，多年来屡有陶水管道、瓦当等建筑材料出土，研究者依据这里的带字瓦当考证此处应为蕲年宫遗址，属离宫性质。蕲年宫始建于战国的秦惠公时期，秦孝公扩建后改为橐泉宫，使原蕲年宫成了橐泉宫的一部分。两宫一直沿用到西汉中晚期。丹凤县古城村商封邑的确认，对研究秦国的赏赐制度和秦楚关系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的遗址全省有4500处之多，其中已公布为“省保”单位的仅有30多处，如正式宫殿有建章宫，离宫别馆有秦的望夷宫、杨赵宫(车舍宫)、口镇宫(谷口宫)、甘泉宫、梁山宫、望山宫、崇凝宫(步寿宫)，汉的鼎湖延寿宫、池阳宫、扶荔宫、西峪宫(葡萄宫)、凹里宫以及“秦宫汉葺”、汉代沿用以前的离宫等，还有秦直道、汉褒斜栈道、沙河桥、汉武关等重要的道路、桥梁及关隘遗址，另外还有龙首渠及五门堰等水利设施至今还在使用。这些遗址虽说多是调查资料，但研究者根据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分析考证，均已确认，为秦汉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隋唐时期的天坛遗址，当时称圜丘，元代以后称天坛，是皇帝祭天活动的礼仪建筑。有关隋大兴唐长安圜丘的尺寸，《新唐书》记载：“依古四成，而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而五减之，至于五丈，而十有二陛者，圜丘也。”1999年经考古发掘出土的遗址与文献记载大体吻合，其总体形制保存较好。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西周以来，天子祀天的制度一直是历代王朝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隋唐圜丘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祀天礼仪制度的演变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兴庆宫遗址，原是盛唐时期玄宗李隆基听政的活动中心，也是唐长安城内三大宫殿区之一。兴庆宫平面布局为长方形，南北长1250米，东西宽1080米。四周围以宫城，西南北三面开七门，东面无门，宫内主要建筑有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兴庆殿、大同殿、南薰殿、长庆殿、沉香亭及龙池等，比太极宫、大明宫的建筑更为豪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考古工作者对兴庆宫的城址、勤政务本楼等17处重要遗址进行了钻探和发掘，殿、堂、楼、阁、亭、渠、池等遗址保存较好，出土遗物丰富。1958年人民政府将兴庆宫遗址辟为遗址公园，为广大人民群众游览休闲的场所。20世纪末在富平桑园发现的数十座唐代砖瓦窑址，为研究富平五座唐陵陵园建筑建材的来源提供了重要资料。潼关县的十二连城及潼关城遗址，都是防御设施，对研究我国古代军事史具有重要意义。宋元明清时期的遗址已公布的“省保”单位较少，陕北志丹县的铁边城、神木县的黄羊城、鄜州故城都是宋时的边陲重镇，或防御或边贸，在当时都起着重要作用，目前除水土流失对其多有损坏外，一般保存尚好，对研究宋朝的防御史有重要价值。惟一的元代遗存斡尔朵遗址是元代安西王府遗址(斡尔朵，蒙语，宫殿之意)，是元朝控制西北和西南的政治军事中心。《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安西王府高大城垣以及宫殿建筑的壮

丽。这一建筑沿用近百年，毁于元末，变为废墟。20世纪50年代经考古工作者调查勘探得知，安西王府平面呈长方形，夯筑城墙较完整，实测周长2282米，四隅外突可能有角楼建筑，东、西、南三面开门。城中央有夯筑台基达王殿，南北长185米，东西宽90米，高出地面2至3米，基础深入地下约2米，达王殿东西两侧也有夯筑基址，可能是庑殿建筑，出土重要文物丰富。自1956年以后，这里的工业建设不断扩大，铁路、马路、厂房、住宅几乎将整个遗址破坏殆尽，现仅存主要宫殿台基的一小部分，实为可惜。明秦王府位于今西安市中心偏东北处，是明朝控制西北的政治中心。秦王府有内外两重城墙，外城称“萧墙”，周长4.65公里，全为夯土筑成，有四门。内城墙因砌青砖，称砖城，周长2158米，亦有四门，城外有护城河，引浐河水，经龙首渠流入壕中。王府内外朝宫和内寝宫为城内的主体建筑群，外朝宫的建筑依次为承运殿、圆殿、存心殿、嘉心殿，嘉靖八年于承运殿后增建王宫一座。明朝亡后，秦王府屡遭破坏，清顺治六年以秦王府改建满城，“萧城”被毁，雍正年间，城内建筑多被拆除，砖城改为“八旗教场”。辛亥革命时期，秦王府毁于火。1921年、1950年、1956年及1958年或拆除或改建都有破坏，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物部门将仅存的几段城墙予以保护，已被保护的这些城墙目前状况较好，仍然屹立于现省政府的周围。清朝的佛坪厅故城遗址，位于周至县南的秦岭深山老林之中，因于1926年县府迁出后变为一般山村，没有现代建设的破坏，将原来的城墙、城门、街道、衙署、商铺、作坊、庙宇、亭、塔、场、坛等都有残迹保存，为研究20世纪以前的古县城规制提供了重要资料。

古墓葬类共72处，若按时代分，属新石器时代的1处，先周的2处，西周的3处，春秋战国5处，秦5处，西汉13处，东汉6处，三国2处，十六国2处，北朝2处，唐11处，五代2处，北宋2处，南宋2处，明6处，清4处，民国1处。若按阶层(或群体)分，历代王朝先世陵墓有周之姜嫄墓、公刘墓、王季陵、秦之惠文王公陵、悼武王永陵(此二陵误传为周文王陵和武王陵)，昭襄王芷陵，孝文王寿陵、庄襄王阳陵(此三陵合称东陵)、十六国时期之前赵永垣陵、北周成陵、唐永康陵及兴宁陵等11处(十二陵)；帝王陵墓周穆王陵、秦二世胡亥墓、前秦苻坚墓、北周孝陵、隋炀帝陵、唐让皇帝惠陵等7处；后妃陵墓有西汉之薄太后陵、窦皇后陵、勾弋夫人墓，唐杨贵妃墓等4处；文武大臣官宦藩王墓27处，历代名人墓18处，以及家族墓地墓群5处。这些单位中有传说的，有世俗误传的，但绝大多数或有文献记载或有碑石记载的或系考古发掘确认的，也就是说古墓葬类中除极少数属误传者外大多数的墓主、时代、位置都是没问题的。这些陵墓大都位于地势高亢，林木茂密，松柏常青的环境优美的风水宝地，墓葬本身封土高大，气势恢宏，为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埋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墓葬中大多数属文物考古调查所知，极少数经过考古发掘，出土资料至为重要。如1999年对北朝时期北周武帝孝陵的发掘，从发现的武帝陵志石、武德皇后志石、天元皇太后金玺、无封土、无石刻、无陵寝建筑、无陵园垣墙及其他重要文物的特点来看，使我们对北周的陵寝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不仅使我们得知了北周不封不树的陵寝制度的特点，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寻找北周孝闵帝静陵、明帝昭陵、宣帝定陵、静帝恭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研究者认为咸阳塬北部今国际机场一带应是探寻北周陵区的重要地区。2000年对唐让皇帝惠陵的发掘，不仅发现了规整的陵园范围和布局及其重要的设施，同时还出土了一大批随葬器物、精雕细琢的葬具、绚丽的壁画以及玉质描金谥册、哀册等，为已发

掘的唐代大型墓葬所罕见。研究者认为对惠陵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盛唐时期高等级皇室宗亲墓的丧葬礼制、贵族生活等具有重要意义。1999年对唐大宦官高力士墓的发掘，发现重要文物200多件，其中神道碑和墓志不仅保存完整而且碑文和志文字迹清晰，为研究唐史及中国宦官史增添了珍贵资料。1992年发掘的五代后周冯晖墓，虽被不法分子多次盗扰，但仍然发现了大批重要文物，其中尤以彩绘浮雕砖、壁画及墓志铭最为珍贵。彩绘浮雕砖出自甬道两侧，原有56块(其中2块被盗)，每两块上下拼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组成28个人物，东壁男性，西壁女性，各14人，形象有男女巫者，弹箜篌、打拍板、击腰鼓、击答腊鼓、弹琵琶、吹笛、吹箫、吹笙、吹排箫、舞蹈等，个个生动逼真，栩栩如生。壁画除墓道、甬道施以彩绘浮雕外，其余部分全是绘画。从壁画的整体来看，结构严谨，线条流畅，色彩艳丽。其主要内容是反映墓主生前骄奢淫逸的生活场景。冯晖志石近正方形，边长95厘米，宽93厘米，厚23厘米。志文楷书47行，满行47字，共2010字。内容主要记述冯晖的生平事迹、五代朔方军集团的构成及其内部的权力之争等，为研究当时藩镇割据的史实，提供了异常难得的资料。冯晖墓的发掘及出土的珍贵文物，对我们研究五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古建筑类共138处。按时代分，属唐代的13处，宋代17处，金2处，元代12处，明清94处。按类别分，可分为古塔40处，古庙31处，佛教寺院20处，道观8处，伊斯兰教清真寺3处，城池5处，各式桥梁6处，商贾会馆5处，名人祠4处，楼台6处，王宫行宫2处，民宅2处，书院、考院、武学、仓库、名人故里及园林各1处。这些众多的古建筑类别都是我省的珍贵遗产，它们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古塔类，全省约有300多处，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10处，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40处，其余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是佛教专门的建筑，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死后由弟子将其遗体火化，烧出了许多光泽晶莹的珠子，称为舍利，众弟子将舍利分别拿到各地安奉，埋入地下，上面堆起一座圆形土堆，这种土堆在印度梵文中称为“浮图”，译成中文称“塔婆”，以后又简称塔。塔实际上是埋葬佛骨舍利的纪念物，它作为佛的象征，供信徒顶礼膜拜。印度的“浮图”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固有的楼阁建筑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式的崇高而华丽的佛塔。这就是我国最初的木结构的楼阁式佛塔，以后发展到唐朝佛教最兴盛时，为防止火灾，木塔多采用砖结构代替，其外形仍保持楼阁的形式。随着佛教的发展以及地域民族传统的因素，遂使佛塔的形式又衍生出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塔形，如密檐式塔、喇嘛塔、金刚宝座塔、缅式塔等，以后又随着佛塔功能的扩大和延伸被民间利用塔形发展为风景塔、风水塔以及重大的事件或名人纪念塔等等，在中华大地形成了塔的系列，遂使我国无论是塔的数量之多、形式之多样、风格之丰富等都是著称于世的。在我省已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40座古塔，均为佛塔，都是原有佛教寺院中的主要建筑，后因多数寺毁仅剩塔存，其中有的耸立于繁华的城镇，有的孤影深山，但它们幸运的是终于熬过了苦难的岁月，得到了如今人民政府的关切。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对这些佛塔都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投入了大量经费进行维修加固，遂使其面貌如初，往往都成为某城、某镇、某村的标志性景观，同时也成为广大僧众顶礼膜拜的场所。这40座佛塔中属于唐代的有12座，宋代17座，金元各1座，明清9座，可见我省的佛塔以唐宋的数量较多。从其形式来看只有楼阁式和密檐式两种，前者如兴平北塔、长

安圣寿寺塔、香积寺净业师灵塔、华严寺杜顺塔、清凉国师塔、富县开元寺塔、合阳罗山寺塔、澄城精进寺塔、周至大秦寺塔、户县敬德塔、眉县净光寺塔、武功报本寺塔、富平法源寺塔、洛川万凤塔等27座均为典型的楼阁式塔；后者如蒲城南寺塔、高陵塔、合阳百良塔、富平万斛寺塔、洋县开明寺塔、铜川塔、汉中东塔等17座均为密檐式塔的佳作。已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庙宇类共31处，其中多为各市县的文庙、城隍庙、关帝庙，还有韩城的玉皇后土庙、法王庙、九郎庙、丹凤的二郎庙、神木的二郎山庙、岐山的周公庙、五丈塬诸葛亮庙、留坝的张良庙等。文庙即孔子庙，简称孔庙，春秋时鲁国初立孔子庙，汉时封孔子为宣尼公，称宣尼庙，北魏循汉制，北齐时各地郡学皆立孔子庙，唐初封孔子为文宣王，诏令各州县皆立孔子庙，遂使孔庙遍及全国各地，自明清以来多称文庙，民国3年礼制馆规定从最古之称为孔子庙，但人们习惯上仍称文庙。文庙的主体建筑为中轴线上的照壁、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明伦堂及尊经阁，两侧有廊庑及其他建筑。大成殿为庙中正殿，殿内正中立孔子座像，左右列四配十哲先贤像，其弟子及历代大儒均分列于东西两廊，岁时致祭，典礼隆重。省内现存文庙完整的少，仅存某些单体建筑的多，如兴平文庙大成殿、咸阳文庙、洛南文庙、户县文庙、蒲城文庙、合阳文庙、安康文庙大成殿、渭南文庙大成殿、旬阳文庙、礼泉文庙、泾阳文庙、铜川文庙大成殿等。近年来虽经投资修葺，但整体庙貌已不存在。城隍庙是祀城隍神的场所。城隍二字始见于《周易》，《礼记》载：“天子大腊八、水庸居其七，水则隍也，庸则城也。”是为祭城隍之始。至唐朝祭城隍神之风逐渐兴起，韩愈、杜牧、李商隐等文人学者皆有祭城隍文，大率为祈雨、求晴、禳灾诸事都要向城隍神祈祷，被人们尊为保佑一个城市的平安之神。五代时后唐封城隍神为王，宋以后城隍庙已遍及各州府县，到明朝又加封城隍神为帝，遂使全国各地大建城隍庙，祭城隍神之风更为兴盛。我省已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武功城隍庙、扶风城隍庙、商州城隍庙及宁陕城隍庙等，均为明清所建，保存尚好，又经近年来的整修焕然一新。其他庙宇也都加强了保护措施。在古建筑类中已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有佛教寺院、道观及伊斯兰教清真寺等宗教建筑40处，如周至仙游寺、韩城弥陀寺、洋县良马寺、智果寺、南郑圣水寺、户县草堂寺、扶风法门寺、西安大兴善寺、安康白云寺、佳县香炉寺、周至楼观台、西安八仙庵、宝鸡金台观、华阴玉泉院、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小皮院清真寺及西乡鹿龄寺等等，都得到了各级政府妥善保护，不仅成为广大宗教人士的活动场所，同时也是各地发展旅游事业的重要景点。另外古建筑类中还有不少类别，因限于篇幅从略。

石窟寺类共23处，加上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4处，共27处，还不及全省已发现的350处石窟寺的十分之一。大部分分布在关中和延安地区，其时代以唐宋的较多，以前或以后较少。北魏至隋仅4处，规模较小，唐宋的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多较大。如富县石泓寺石窟，延安清凉山万佛寺石窟、甘泉县石宫寺石窟及黄陵县双龙石窟等，规模都很可观。石泓寺石窟，现存洞窟7个，分布在长达70米的山崖上，主窟前有三开间两层大殿一座，窟平面近方形，面阔10.3米，进深10.65米，高5.35米，窟中央佛坛四角设4根方形接顶石柱，佛坛正面造像为一佛二弟子，东侧石柱间为文殊菩萨，西侧石柱间为普贤菩萨，石柱四面均刻佛、观音、罗汉及小千佛像。窟之四壁浮雕佛、弟子、菩萨及小千佛像。窟内共有造像3305尊。清凉山万佛寺石窟，主

窟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前宽16.1米，后宽17.6米，进深12.9米，窟顶中部高6.7米，窟内造像万尊。宋代及其以后佛道合流的石窟广为流行，为省内石窟中较为突出的特点。如甘泉县石宫寺石窟最为典型，主窟平面呈方形，八卦顶，窟中部凿石成方形佛坛，佛坛四角设4根方形接顶石柱。佛坛上置三世佛造像。窟的左右壁各开三龛，分别雕菩萨、太上老君和释迦多宝，后壁开七龛，正中为道教像，其余为佛像。延长县七里村石窟也是一处释道合一以道教为主的石窟。

陕西现存各类石刻上万处，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一小部分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0处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10处中以长安区的牛郎织女石像最早，为西汉石刻，其特点为雕技原始，造型古朴。其余多为唐代名碑，如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碑”、唐玄宗李隆基书“杨珣碑”、柳公权书“李晟碑”、李邕书“云麾将军碑”、韩秀弼书“李元谅碑”等均为一代佳作，具有极为珍贵的书法价值。

陕西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遍布全省，尤其陕北地区特别集中，它们都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名人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风云激荡、可歌可泣历史的载体和见证，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截至目前，已有6处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处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一部分已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弘扬民族精神及时代精神方面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已公布的单位大都得到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并投入大量资金予以维修和保护，如渭华起义革命旧址、马栏革命旧址、吴起革命旧址、南泥湾革命旧址、神泉堡中共中央驻地革命旧址、李鼎铭陵园与故居等等，都得到了维修和保护，有专门的管理机构，都已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青少年学习革命传统、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课堂。

从以上对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概况的介绍来看，它们都是从不同类别中精选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单位，是我们伟大民族发生、发展、绵延百万年不断前进的悠久历史的体现，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灿烂文明的反映。这些单位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下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都划定了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前三批都树立了永久性的保护标志，大部分单位设置了保护机构或有专人看管，所有省保单位都建立了国家统一规范的记录档案。

陕西省文物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等法律法规，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和原则，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利用的辩证关系，认真做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工作而组织编纂此书。该书对全部省保单位运用最新资料作了科学而又比较详细的概述，并配有大量照片和插图以便阅读。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最新的科学资料，能对陕西省的各项工农业建设、旅游资源开发、改革开放、对外文化交流、经济合作等有所裨益。同时也希望本书能在普及文物知识、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005年10月15日